

司马朔
◎ 著

一个 异端

思想家的心灵史

李贽评传

他是明代思想界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
他是明末拥有『粉丝』最多的超级畅销书作家。
他的思想暗示着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一个异端
思想家的心灵史
李贽评传

司马朔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异端思想家的的心灵史：李贽评传 / 司马朔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633-9902-4

I. 一… II. 司… III. 李贽 (1527~1602) —
评传 IV. B248.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841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250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楔子	(1)
泉州少年	(3)
扑朔迷离话家世	(6)
反骨初露	(8)
奔命尘缘	(21)
辉县教谕	(21)
千里奔丧几时休	(34)
“道”的诱惑	(53)
姚安知府	(71)
仁政以安民	(75)
垂拱而治	(90)
选择与梦想	(98)
贰臣逆子	(118)
婴其鸣矣,求其友声	(118)
异端	(130)
观音原来是知音	(137)
《焚书》论战	(146)
被逐黄鹤楼	(177)
佛陀之光	(186)
削发麻城	(186)
借彼宝刹,读我《易经》	(197)
《藏书》名山史迁梦	(214)

童心颂	(226)
士贵自适其性	(226)
迷茫童心	(238)
王学弟子	(248)
阳明旋风	(248)
豹尾	(253)
道学的困境	(264)
《水浒》情结	(268)
借绿林酒杯,浇文人块垒	(269)
恣肆评点说风流	(283)
最后的审判	(289)
魂断通州	(289)
《焚书》不焚,《藏书》不藏	(315)
参考书目	(330)
后记	(331)

楔 子

李贽亡灵(以下简称亡灵):这是哪儿?

小鬼:地狱门槛儿。

亡灵:我要到哪里去?

小鬼:这要看你自己。

亡灵:啊,我好痛……我好累……我要去了……我……

佛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亡灵:啊,我终于到岸了。佛祖,快来救我!

同乡:你这个不忠不孝,绝情寡义的家伙,也想成佛,哪有这等便宜事?哼!

书生:你这个非圣无法的名教罪人,该下地狱才是!

亡灵:这……[转而愤愤然]哼!地狱就不是人下的?我今儿个索性就下了这个地狱也罢。地狱再苦,我想也强似听你们这伙乡愿的聒噪,强似瞧你们这帮假人的嘴脸,真让人恶心……哼!小鬼们,快带老夫到那地狱里去逛它一逛!痛快,痛快!哈哈哈哈哈……

小鬼:老头儿且慢,认清门牌号再说。

[亡灵抬头一望]青灰色砖头砌成的结实巍峨的城门两边,镶嵌着一副黑底白章、气象森严的对联:

觉已度人

烈焰
乃是
清凉
门

辛
苦
皆
缘
迷
妄
念

“咦？”亡灵不由觉得如一瓢冷水陡然浇背，顿时清醒了许多。
“也是，我这辈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到底干了些什么？还真要想
想，想想，想想……啊，我好痛……想想……痛……”

泉州少年

泉州，福建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北岸的一片秀灵之地，因其北郊的泉山（又名清源山）而得名。隋朝开皇九年（589）始改丰州置泉州，时治在今福州市之闽县，辖今福建全境。唐朝时福建境内分置数州后，泉州辖境始缩小为闽江下游地区，后一直为州、路、府之治所。唐景云二年（711）改原武荣州为泉州，治在晋江，即今天的泉州市。元朝时为泉州路，明朝时改为泉州府。

泉州府在宋元时辖有今晋江流域、澎湖列岛及厦门、金门、同安等市、县，是当时中国海外商业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为便于管理和税收，宋元祐二年（1087），宋朝政府在州城设置了相当于今天国家“海关”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对海外商业贸易的管理和税收。南宋至元，这里是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中心。为此，当时的泉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特区”供从阿拉伯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居住，谓之“蕃坊”。在元初时来到中国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眼里，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热闹的商港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比广州早几百年。

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千多年前泉州城的情景。这里当然还没有高速公路、飞机和高楼大厦等这些现代化的象征物，但她依然有着那个时候在全国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独特风韵。你一来到海岸，就会立即被这片耀眼的蓝所征服。这里，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你的一生中，可曾有过什么时候如此时，十分真切地有一种纵情投入大自然母亲怀抱的感觉？你不由得想喊、想叫、想跳，甚至想飞！是啊，你真想知道地到底有多

大,天到底有多高。到此时,你才真切地意识到,以前的你,真真是一只井底之蛙,活得可怜极了,今日之你才真正一睹海的容颜、海的生机、海的风韵、海的胸怀。伫立岸边,纵目远眺,在蓝天白云之下是点点白帆,那是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生活在船上的那些你也许根本不认识的人,正是当时世界上活得最累,但也是最有见识、最有生命活力的。码头上挤满了五颜六色,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穿梭如织的人们正忙着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搬上搬下。进入城内,沿街店铺林立,商贾如云。信步其间,你会不经意间看到斯里兰卡的银首饰、印度的香料、马达加斯加的木雕,或波斯的挂毯。这里,你亲眼见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其乐融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说,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以黄为生命主色调,那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蔚蓝色才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他们自幼就有一种“海之恋”,不安于土地的安稳,宁愿置身于诡秘莫测的海洋,喜欢驾一叶扁舟,去海上讨生活。到附近海域捕鱼捞虾,或干脆一帮人树起风帆,趁着季风,飘洋过海,来往于两洋三洲之间。海之旅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彻底交付给大海,蔚蓝色的海水便是命运的象征,既是诱惑,又是考验。虽“来自黄土,死后必归于黄土”,但一生的精力却是在征服海洋。

黄代表着一种质朴,一种厚实,一种安稳。千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发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世代代背朝青天,面向黄土,靠一片后土,一双粗手,再加上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稳定节律而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也就基本上可以生存了。这培养了他们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和对这个世界太多的信任感。他们相信这个地球是为人而诞生的,星星是为人而闪光的。人类已有的几种生存方式相比,农耕是安全系数最大的一种,但这种

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人们养成了得过且过、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惰性。

海的蓝色也给这里人们的命运涂上一层浓浓的以蓝色为底蕴的传奇色彩。出海去，意味着主动地去跟命运打赌，对幸福的追求是热烈的，但由出海而带来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格外触目惊心。

海是地球上最活跃、最不安定的部分。蔚蓝色是诱人的，她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她温柔，安祥如母亲的怀抱；她威严，能顷刻间吞灭一切。“蓝”代表着一种活力，一种挑战与应战，一种不安分，不安于现状，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整个民族还满足于以农为本，“不患贫，患不均”的小农经济时，这里的人们就有了强烈的商业意识。在这里，君子不以言利为耻，大大方方地以富裕为人生理想，不满足于靠生产来果腹，而喜欢靠经营，靠贱买贵卖来生利，而且，还把生意做到了国外。长期的海外贸易传统，泉州人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大脑。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先驱。这里是中国中古世纪最早的经济特区，最早以商业性闻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度与时代，这里的人们最先走出黄土地的限制，面向海洋，面向世界。当整个中国的人们还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心时，这里的人们就远涉重洋，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色彩斑斓的世界；当全中国的人们还抱着华夷之别的偏见时，这里的人们已经了解了海外的异域文化，而且已经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了。他们已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泉州也以开放性，以多姿多彩的文化交融名满天下。

虽然对今天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太平常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千万别忘了，当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自守，基本上与世

隔绝的状态。一直到明朝，中国的海禁还甚严，既禁海民私自与外国人有各种交往，也禁止沿海渔民入海捕鱼。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这里，不论其开放的人生视野，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还是其浓烈的相互交织的多彩文化，对尚处于中古时代的中华帝国，都是一道极其难得的风景线。

中国自古就有“地灵人杰”之说，以为山川之灵气一定会造就风流人物，这大概是“天人合一”信仰的一个具体表征。依此，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如果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物或事件，就应该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也许相反，如果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物或事件，反倒不可思议。

我们的主人公，明代伟大的思想家李贽就是凝日月之灵气、集山川之英秀、汲多彩之文化而成就的一位名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人文胜迹，都为李贽这一思想家的成长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底色，成为其心路历程中的十分重要的无意识积淀。

扑朔迷离话家世

李贽所在的福建晋江的李姓家庭一如泉州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更恰当地说，正是色彩斑斓的泉州文化的典型代表。

晋江的李氏初祖李辅官，字弘弼，为唐朝武阳懿公李大亮之八世孙，河南光州刺史李若翁之中子。唐僖宗乾符元年（874）时，李辅官任安徽寿州参军。僖宗光启元年（885），秦宗权发乱于河南蔡州，李辅官依令前往。辅官长期寄居于福建的汀漳，第二年，叛乱既平，李即率部返回福建。最后，兵事息，依例部卒就地解散，李辅官也就在福建的泉州安家定居了。

话说李辅官一脉传至第十九世李闰（字君和），已是元朝末

年。李闰有二子：长子名弩，字景文；次子名端，字景顺。就是这个李弩，后来改姓为林，又叫林弩。从此，李姓一门，分为二宗，一支仍继承李姓，另一支则转为林宗。但后代子孙们往往有先林而后李者，又有先李而后林者，林李各有其谱，然又有林李合谱。林李二宗分分合合，甚是繁复，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这一分为二，自有其中缘故；分而又合，反证出扯不断的血缘亲情。李贽对这种有分有合的林李故事就甚引为骄傲，后来他特为其一世祖作一对华表云：

九世同坟，历代明禋先俎豆，
一宗两姓，熙朝文物夸李林。

那么，李弩为什么会改姓为林呢？

原来，这李弩素以海上贸易为业，他家的船常往来于吴越间，当时即是泉州有名的巨富。明初太祖洪武九年（1376），李弩奉诏出海去西洋。返乡时，竟然带回一位阿拉伯太太，而且他本人也信奉了伊斯兰教，一应生活行为习俗，均依其夫人而行。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家族，当时其父祖的心境，举族乃至全乡的哗然，是可想而知的。身为华夏之人而娶夷人，习夷语，这不是“以夷变夏”，与祖训正好翻了个儿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虽有后，然为夷人血统，变了汉种，这与无后何异？身为长子，竟公然干出这等断祖宗香火的大逆不道之事，真是要眼睁睁气死乃翁。此后，还有何面目见眼前族内的众人和死去的祖先呢？气愤归气愤，但李弩天生是个执拗的种，不管族内长辈的软磨硬吓，就是不改其行，终身信奉伊斯兰教，也不休他这位“色目”太太。最后，万般无奈，族人们做出决定：将李弩逐出李门，令其自立门户，此后子孙也不得以李为姓，于是，李弩从此便改姓为林，这便是林李分宗的由来。这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处罚，也是宗法社会中最典型的对叛逆的制裁。

然而，这一事件虽对李姓族内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想来在泉州这个地方，绝非第一次，也非唯一的一次。如上所言，泉州城，晚至南宋时，就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定居于此做生意，长期以来，汉族与这些异乡人你来我往，互相交流、彼此影响，以至通婚，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一事件，虽在发生时很让当事人有些激动，但后代子孙们便会见多不怪，想来以后的泉州人必不少效仿李骛者，故而林李二宗的后代们想来也渐渐对祖辈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说来说去，林李二氏毕竟是同门，于是，便有了此后林李二姓相依相助的和谐关系。

作为晚辈的李贽，读到其第二十世祖林骛的人生故事后，该作何感想呢？想来作为有着同样坚卓个性的后人，他一定会对其先人有深刻的理解、宽容，会心一笑后甚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赏与自豪。没有先祖特立独行的风范，也就不会有李氏门宗的传奇色彩。想必李贽日后面对世俗对他的刻薄时，这位先辈的浪漫故事一定给他不少的精神安慰，他一定会引以为同调，视之为前辈知音了。

反骨初露

明朝嘉靖六年(1527)农历十月三十日，福建泉州府晋江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李姓家庭的院落里，一个崭新的小生命哭喊着来到了人间，这便是李贽。瞧他的相貌，听他的哭声，除声音略大些外，看不出有什么怪异之处。加上是个头生子，头胎而有弄璋之喜，实在是这个家庭天大的福气，一家人上上下下，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没有谁能料到这个小家伙日后会有卓立的个性、奇崛的命运和惊世的声誉。

很快，事实证明这个小家伙是个福薄的可怜虫。降生没几日，生母徐氏即病死。人生三大不幸，这第一桩——“少年丧

母”就给他赶上了，不是个天生的苦瓜又是什么？也许，这是老天给他的第一个人生下马威，一开始便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谁说人生不是苦海？

与其他人对童年有的幸福记忆不同，李贽的童年是朦胧而又苦涩的。后来回忆起来，他只记得自己“幼而孤”，都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怎么长大的。反正，比别人家的孩子少了许多欢乐和在母亲怀抱撒娇的权力。严父毕竟是严父，虽因丧母对他格外心疼，但父亲的关爱怎能比及母亲的细致入微。他需要做许多同龄人根本无需自己做的事情。在严父的培养下，自小练就了一副凡事都要自己来的倔脾气。所以他后来回忆说，他自六七岁时，便能自立。

七岁时，父亲白斋开始为他发蒙。虽然后来成了思想家，但作为孩童的他，与当时所有同龄人的起点是相同的。作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文化人转折的起点，李贽照例从“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开始，然后便是《诗经》、《论语》等。那时的发蒙教育，是不兴讲解的，要求的是背功，讲究的是“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背诵之外，稍有点趣味，带智力游戏性质的课，便是“对对子”，古人相信“凡物必有对”，先生出一个词，才思敏捷学生会很快对出来。待年龄稍大些，对子便由词发展到句，除了词性要求，又有了音韵方面的限制。这其实是这个诗的国度中训练国民诗意的最朴素形式。它要求学生以“对”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其实，有什么样的眼睛，便有什么样的世界。长此以往，每个中国人都是善于以辩证眼光望世界的专家。它又是一种语言的训练，培养学生对语言音乐美，即对音韵、节奏方面的爱好与敏感，培养他们对作为概念的词性的敏感。这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的训练，敏捷的才思要以一定的文化积累为基础，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肚子里装满了从书中读来的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时，“做对”始能成为一种乐

趣，否则便是一桩苦役。“对”不只从自然中来、现实中来，还从书本中来，从文化中来，论及后者，便谓之“用典”，是否会“用典”，用得是否广博、自如，便是对一个书生文化素质、基本功的测试。因读书甚少而用不来典者固无足论矣，即有相当“典故”基础者，又可分为两类。机巧者讲究“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即用典而不露痕迹；质实者则径以掉书袋为事，直如盐商斗富，青楼弄粉一般，已离诗甚远，堕入俗谛魔道一路。

发蒙的起点是识字断文，终点则因父祖辈自身的文化素质、人生抱负为异。李贽的父亲显然属于心力甚高一类。李贽刚有了点文字底子，父亲便开始对他进行正儿八经的文化经典训练。据他后来回忆，李贽十四岁时改学《尚书》，而在此之前，他已学习过《礼》和《易》。“余自幼治《易》”，这“幼”的上限是几岁，不可详知。我们只知他七岁始发蒙，学《易》当在十岁左右。以今天的情形看，这简直是一种奇迹。《易》、《礼》与《书》，均是儒家经典中最难的，读者、专家都为之蹙额，而这些竟然是一个十多岁小朋友的文化课读本，不管李贽及其父亲当时究竟读懂了多少，我们还是不禁对他们，对当时的人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学童期间，李贽真正开始崭露其精神个性的事件，是写了一篇作文。

一天，李贽的父亲白斋公给孩子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老圃老农论》。

此题出自《论语》中“樊迟请学稼”的故事，《论语》的《子路》章中说，有一天，孔子正在给众弟子上课，座上一名叫樊迟的学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回答说：“这个么，我就不如老农了。”樊迟又问夫子如何种菜，孔子说：“那你去问菜农好了！”樊迟刚刚从屋中退出，孔子就对其他人说：“樊迟真是没出息的家伙。如果在上位的人们爱好礼，老百姓就没有一个敢不恭敬从事；如果统治者都好讲义，人民就没有敢不服从的；上司讲

信用，下面的人就充满了人情味儿。如能做到这些，四方邻国的人们就会拖儿带女地投奔而来，哪还用得着学种庄稼呢？”

这便是这道作文题的出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尊法批儒时，这个故事还成了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一个笑话。今天，时过境迁，也许我们不再发笑，但似乎孔子的回答并非所问，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怎么能用政治操作代替生产劳动呢？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儒”也就成了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其实早时并不如此。最早的“儒”是“术士”之义，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宗教界人士，即从事宗教巫术活动的人。这正印证了人类最早的知识分子是宗教人士的观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是包括了占卜、祭祀在内的宗教巫术活动。宗教是人类精神活动之起源、文化知识之原型，由于宗教处理的是人力之外而又决定人吉凶祸福的事，神秘而又重要，因而也就成了人类最早的专门性精神文化活动，从事这类活动，在人事与天命间做中介的人就成了最有学问，最重要的人物。

进入周代，以周文王为代表的新的统治者加强了政治礼乐制度的制定，整个社会历史理性因素增强，宗教气氛减弱。于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有所改变。他们要参与国家政治礼仪制度的制定、政府文件的起草、王朝历史的记录、贵族弟子的教育等世俗性更强的文化活动，此时的“儒”神秘色彩减弱了，但在社会和国家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是社会中的核心人物。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政治操作成为上层社会活动的重心，“官”成为一种主要角色，帝王及其重臣们固然是官。从事巫术、祭祀的也是官，叫“卜官”；记录帝王重臣言行的也是官，叫“史官”；朝臣们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就退休，但并不回家，而是到各地学校任教，当老师。“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

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尚书大传·略说》）。官当到七十岁才退休，七十一岁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当教师，我真为古人超人的生命活力感到震惊。教师虽不是官，但是由前官员充任，仍与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春秋前，这种“儒”者集知识分子、史官、国家管理人员、教师等角色于一身的情形，叫做“官师合流”。这种情势无意中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和心仪政坛的“官本位”情结。

春秋后期，周王朝失驭，各地诸侯势力崛起，中国社会为之一变。中央政府崩溃，朝廷已养不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于是，大量的知识分子被社会动荡的激流抛出政治核心，散落民间。但是，他们也要活命，也要吃饭，于是，就开始在民间发挥他们的特长，或在乡间婚丧嫁娶时充当礼宾，或在家里收些小孩，为他们发蒙，作专职教师爷，这种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分离的情形，就叫做“官师分流”。

官师分流，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用今人的眼光看，这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现深入分工的结果，是较为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正式诞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进步的标志，是大好事。

孔子正是身处于“官师分流”社会激变的一代知识分子，但他当时的心境并没有如此平静，他并不以为这是好事，是进步，而认为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标志。

这些以孔子为代表的生逢“分流”的知识分子都是些悲剧人物。他们一方面缅怀西周时“学在官府”的荣耀，过去的好时光，另一方面又无力抗拒官师二分的历史潮流，似乎他们已被永远地逐出了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庙堂，成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缘人，而只能永远地在民间当一名教师爷了。传统的知识观、价值观（以政治操作为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以入仕从政为实现人生价值理想的最高，也是唯一的途径）与其极其